

唐墓出土三彩骆驼驮囊兽首形象属性考

沙武田

【作者简介】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文物》(京),2021.2.5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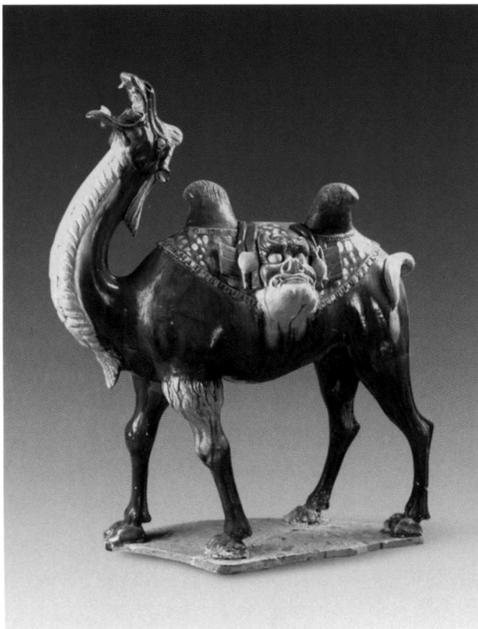
三彩驮囊骆驼作为唐墓“旧材料”,是大家熟知的考古资料,西安、洛阳两京地区多有出土。作为丝绸之路象征符号的骆驼^①,自北朝、隋唐以来,一直是体现墓主死后世界生活和所拥有财富的常见随葬器物^②。颇为有趣的是,从历代墓葬出土的各类骆驼看,古代艺术家在强调千姿百态的骆驼形象的同时,往往会把观者的视线聚焦于双峰间驮载着的五花八门的物品,根据形象特征可以明确物品种类的有胡瓶、扁壶、皮囊、银盘、象牙、丝绸等,其中以西安南郊唐墓(M31)三彩骆驼(图一)所驮载的物品颇具代表性^③,另在骆驼身上还可见野兔、野鸡、大雁等狩猎所获物品,也有用于宿营的帐篷、穹庐及其木排、支架^④。目前,学术界较多关注骆驼身上小件或附属类物品,对于骆驼身上用于装载货物的驮囊,考古简报和研究文章多以“兽面驮囊”“虎头包囊”“虎头驮囊”等一笔带过,虽有研究者注意到骆驼身上的囊袋,但未深究^⑤。受泥塑限制,在无法知道驮囊内盛装物品的情况下,学术性的描述、介绍、研究文字大概只能如此。学术界虽然曾探讨动物皮作为珍贵物品传入汉地及其使用的情况^⑥,但还无人关注动物皮除在衣服、装饰、礼仪、宗教等场合使用以外作为运输包装材料的用途。鉴于此,本文拟对唐墓出土骆驼驮囊的包装用途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最早对唐墓出土骆驼驮囊进行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的是姜伯勤,他以洛阳安菩墓出土三彩骆驼兽首驮囊为例(图二)^⑦,把此类在两京地区唐墓出土带有兽首驮囊的三彩骆驼纳入粟特—突厥相融的祆教信仰与马驼“皮袋”祀祆的风习,并检出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境异》中的一段文字:“突厥事祆

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⑧根据图像和文献记载,作者认为此类骆驼身上的兽首形象即是《酉阳杂



图一 西安南郊唐墓(M31)出土三彩骆驼



图二 洛阳安菩墓出土三彩骆驼

组》记载突厥人“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再结合安菩墓志信息，作为粟特人后裔、突厥“六胡州大首领”的安菩，其墓葬随葬器物中出现此类形象，实有深厚的安菩个人和家族的粟特族属背景，更是粟特与突厥祆神信仰的需求^⑩。此观点一出，引起学界热烈讨论，有直接赞同者^⑪，也有人以此类骆驼主要出现在“安史之乱”之前唐墓为依据，结合755年前后胡人在唐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肯定祆神之说^⑫。另有人以章怀太子墓狩猎图中骆驼上出现的兽形神像，结合唐代文献所记帝王狩猎时胡人参与的史实，以佐证这种形象为祆神的可能性^⑬。

除肯定外，也有意见不同者。把胡瓶等日常用品和打猎所得野味挂于被认为是祆神的兽首驮囊之上，似有对祆神的大不敬嫌疑，所以此类驮囊不应被理解成粟特人所崇拜的祆神^⑭。既然是“四时祭祀”的祆神，把其与丝路上商旅日常使用或贩卖的胡瓶、扁壶、花盆、象牙、毡帐、穹庐、支架、木排、丝绸、绢帛甚至野鸡、野兔、大雁、肉块等不分性质、类别杂呈一起，甚至还有猴子或胡人骑于兽首驮囊之上^⑮，出现于这种环境下的兽首驮囊是无法轻易和祆教神灵联系在一起。另外，从技术层面出发，毡是无法刻形的，若有可能，文献所记“刻毡为形”只能理解为毛织品“缛”工艺技术，再结合敦煌白画等题材中的人形祆神，从而否定了此类三彩骆驼驮囊上的兽首形象为“祆神”的可能^⑯。

显然文献记载“盛于皮袋”的祆神与墓葬所见骆驼驮囊兽首形象外露的事实之间存在出入，同时“刻毡为形”的祆神与仿真兽首在技法和表达手法上也有明显区别，而作为表达墓葬财富观的三彩骆驼与祆神信仰之间则有本质不同，无法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考察那些出土背负兽首驮囊的三彩骆驼墓葬的墓主族属关系，也有不一样的启示。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并非所有出土兽首驮囊骆驼墓葬的墓主均有信仰祆教的胡人背景，如668年张巨合墓^⑰、691年屈突季札墓^⑱、698年独孤思贞墓^⑲、706年章怀太子墓^⑳、中堡唐墓^㉑、关林唐墓(M59)^㉒、关林唐墓(M1305)^㉓。有明确汉民族属性的墓葬随葬器物中大量出现背负兽首驮囊骆驼，则为理解此类兽首驮囊的祆神属性带来解读的挑战和困难。祆教作为外来

宗教，在中古时期流行于入华的胡人聚落群体，三夷教中，唯有祆教没有深入到汉人社区，而一直是粟特人为主的胡人信仰的宗教。而景教到唐代甚至渗入皇宫后室，就其艺术的传播，以唐敬陵武惠妃墓大型石椁石刻中的“拂菻风”图样为典型事例^㉔。因此，唐墓中颇为常见的骆驼兽首驮囊形象，与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崇拜祆神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得到墓主民族属性的支持。而明确拥有粟特人背景的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天水石马坪墓及固原粟特人墓葬中，并没有发现此类骆驼兽首驮囊形象，颇值得考虑。因此，丝路上常见骆驼所负载的驮囊上的兽首形象，是否果为《酉阳杂俎》所记突厥人“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空间。

墓葬中出现身上负载驮囊的三彩、陶骆驼，在北朝和隋唐墓葬中并不鲜见，尤其以唐墓最多，学者们在探讨丝路胡商、胡俑时多有梳理，前文所论曾被认为是祆神的兽首驮囊形象，仅是其中一类，还可见到大量无兽首驮囊的骆驼。

丝路长途运输中包括驼、驴、骡、马在内的商队，用于贸易交换的商品主要的包装方式是用皮毛加工而成的口袋即各式驮囊，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20世纪70~80年代，动物皮毛加工的口袋耐磨、防水、防晒，是科技不发达时代驮囊的主要材料。从丝路长途贩运的角度看，对于像生丝、绢、帛、练等脆弱的丝绸货物而言，应当充分考虑货物盛装袋子的防风沙、防雨水的功能^㉕。毛织类产品虽然是粟特胡商本民族特产，但还不是最理想的长途包装材料，皮制品才是最理想的包装材料。《太平广记》载虬髯客用来盛装人头和心肝的即为“革囊”^㉖，显然是皮制袋子。因此，“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包装方式记载了“皮袋”作为物品运送包装的史实，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曾被认为是“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祆神的三彩骆驼身上的兽首形象，很可能是骆驼身上运装物品的驮囊包装。以西安中堡唐墓三彩骆驼(图三)和洛阳关林唐墓(M59)三彩骆驼为例，就其形象本身，可直接理解为虎、豹等大型动物皮毛制作的袋子或包装覆盖物，而且极有可能使用了类似制作动物标本时使用的整体剥离方式，这样兽首便会完好地留存下来。

唐代诗人张祜《雁门太守行》中写道“驼囊泻酒

酒一杯,前头滴血心不回”,此处诗人笔下所描述的可以装酒的“驼囊”,其实是三彩抱皮囊胡人俑所持表现“胡人岁献葡萄酒”的皮制“酒囊”,即文献所记“鸱夷”“革囊”“韦囊”^⑧。革囊盛酒,体现历史时期动物皮毛加工工艺的精湛,由此亦可推测骆驼驮囊中皮囊应普遍存在。

据居延汉简等资料可知,汉代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行囊”“行橐”中就有“布囊”“革囊”,其中的“革囊”是用熟羊皮制作而成,多用于西北边防役人等长途旅行时置放私人物品^⑨。说明早在秦汉时期,用动物皮革制作的驮囊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以唐人笔记小说为主的各类典籍中记载的“革囊”“囊橐”“布囊”“毛囊”,多为行人随身所用小包。至于液体物品如酒的盛装运输,在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张议潮出行图驮载运输队伍中,骆驼双峰两侧驮运的用来装酒的木桶图像(图四),则是汉地本土盛酒器具和短途运输酒的珍贵历史遗存,惜未看到以驼囊形式盛装运输酒的实物^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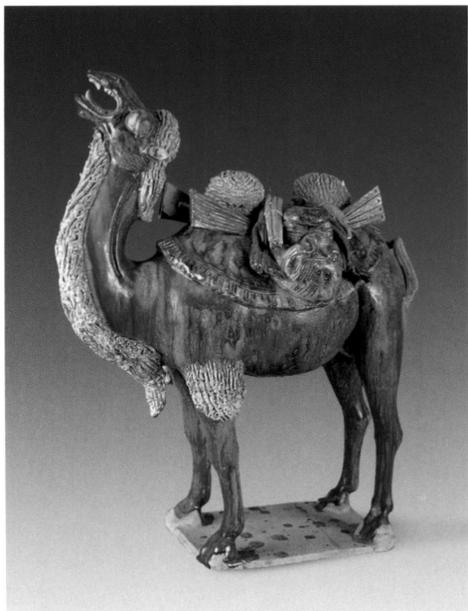
动物皮毛是古代最理想的防风沙、防雨雪、防曝晒的包装材料,极耐磨损,非常适合长途运输。因此,前述兽首驮囊形象,应与包括中亚粟特地区在内的古代欧亚北方地区利用兽皮制作袋囊传统有关。据研究,花刺子模地区即是历史时期主要的皮毛出口地,其中就有黑豹皮、山羊皮^⑪。事实上,粟特地区

大型动物如老虎、豹子等颇多,虎豹皮也较为便宜,因此粟特商队大量使用是可能的,《册府元龟·外臣·朝贡》记载西突厥献“狮子皮”也可为佐证^⑫。至于佛教“天龙八部”乾闥婆、披大虫皮的天王像和墓葬天王武士俑中所见身穿完整虎皮、狮皮或豹皮形象,更是常见,且往往显示的是整张的动物皮,头部、五官和四肢、尾巴清晰可见,以榆林窟第15窟前室吐蕃时期库藏神眷属乾闥婆(图五)和莫高窟第205窟吐蕃时期天王像最为典型^⑬。

从动物身上完整剥离下来的皮子,作为长途运输过程中货物袋囊或包装使用,在古代应该并不稀有。据《通典·食货六》记载,唐代定襄郡、归德郡等地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是“豹尾”,那么豹子皮则有可能用来制作驮囊和衣服,而据同书和《新唐书》记载,河西走廊的武威郡、晋昌郡、酒泉郡、张掖郡及今



图四 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中的驼队



图三 西安中堡唐墓出土三彩骆驼



图五 榆林窟第15窟库藏神壁画

蒙古地区向唐王朝进贡土特产中均有“野马皮”或“野马革”^⑧,野马皮除用于军队甲冑制作外,也有可能作为运输包装材料使用。西安元代王世英墓出土陶载物马,其上所负驮囊覆盖有完整的虎皮(图六)^⑨,同样的器形亦见于户县元代贺氏墓^⑩,显然是用虎皮来防风沙雨雪,说明在历史时期一直将大型动物皮用于货物运输过程中的包装和保护材料。

受西安元代王世英墓和户县元代贺氏墓出土器物的启发,是否可有另一种可能的推测,即驮囊上覆盖连带兽首的大型动物整张皮毛,是丝路上胡汉商人长途运输过程中,对较为脆弱的丝绸织品及其他贵重物品进行有效保护的重要手段。以大型兽皮覆盖在驮囊上面,最终展现在以三彩骆驼为代表的随葬器物中。另一方面,老虎皮也是丝路重要商品之一,例如吐蕃实行“大虫皮”制度,但吐蕃本土没有老虎,因此老虎皮当来自丝路商队贸易。《册府元龟·外臣·朝贡》记载唐武德五年(622年)“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⑪,说明大型动物皮在丝路上传播的史实。

以上推论也可以得到部分骆驼兽首驮囊细节表现手法的佐证,如洛阳关林唐墓(M59)出土三彩骆驼驮囊(图七),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兽首下伸出两道带状线,即是表示兽皮下驮囊的捆绑方式,相同或类似的三彩或陶骆驼所驮兽首驮囊捆绑方式在唐墓出土器物中并不鲜见。这种带子出现在兽首形象的包装或覆盖物下面的驮囊中,显示兽首包装与驮囊是可以分离的两件物品。当然也有见到在包装显示上二者不分的情形,较早的如山西太原沙沟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斛律彻墓出土陶骆驼,其上驮囊两端同样有兽首形象^⑫,但用于固定的带子在兽首包装上面(图八),此类情况的出现实际表达的是在兽皮覆盖物上面捆扎的方式,或属大型兽皮缝制驮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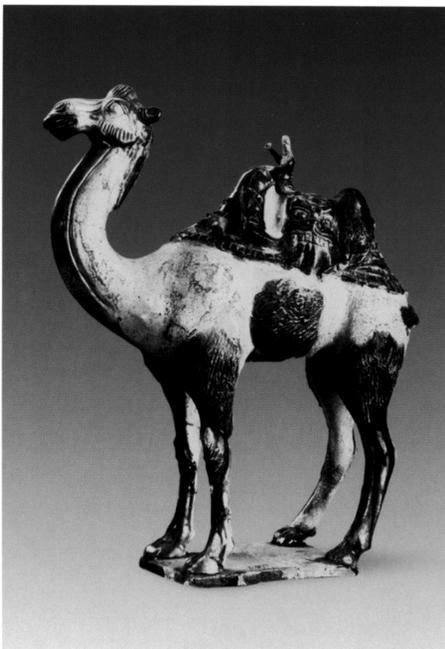
被学者们用来集中讨论的安菩墓出土三彩或陶骆驼上的兽首驮囊中没有出现上述捆绑的表现手法,当属技术表现手法所致,即唐代的工匠们在制作部分三彩骆驼时,并没有完全忠实地表现兽皮覆盖于驮囊之上二者附属之关系,而以简略的手法处理,故从图像表达上把二者合为一个整体。作为墓葬中供墓主使用的随葬器物,虽然有现实生活作为粉本,但是在具体制作时,并不一定完全忠实于现实影像,

最后往往成为工匠们手中的艺术作品,有增有减,像三彩骆驼驮囊之兽首对称出现在驼峰的两侧,即是艺术对称使然,而非丝路现实写照。

至此,可确认唐墓出土三彩骆驼所驮之驮囊上出现兽首形象物品的性质为动物皮包装或保护类材料,一定意义上也为否定“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论断提供了佐证。隋唐墓葬中常见的各式



图六 西安元王世英墓出土陶载物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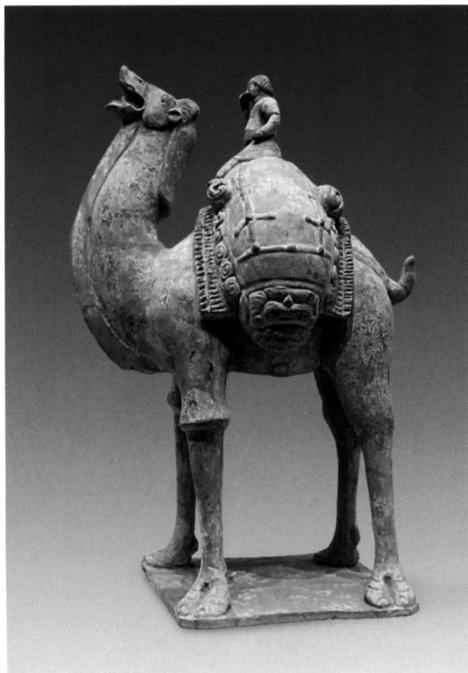
图七 洛阳关林唐墓(M59)出土三彩骆驼

骆驼上出现的驮囊形象,除了以上独特的兽首形象者外,另可见到较多的无兽首驮囊,可以根据驮囊的纹样装饰加以理解。如唐郑仁泰墓出土陶骆驼(图九),驮囊的两端呈圆筒形,用绳子将其固定在骆驼双峰之间,其下有用于宿营时搭帐篷的木排,其上挂胡瓶、扁壶、野鸡,还有外露的丝绸与绢,还有一只小猴子,表现出浓郁的丝路风情^⑥。该驮囊上覆盖一件毡毯类方形物,表面装饰分两部分,中间为花瓣纹,四周云纹环绕,毡毯的四边以两道红色直线画出,以示与下面驮囊的区别。在毡毯下面是真正的驮囊,以墨色画出小圆圈纹样,在四面最下边以墨线画出上粗下细的射线状线条,类似斑纹豹皮。这种斑纹豹皮作为服饰多出现在北朝隋唐壁画墓中的武士身上,如忻州九原岗北齐墓墓道壁画武士像^⑦,在唐墓仪仗图等壁画中则更为常见,章怀太子墓狩猎图中,就同时出现猎豹和相同豹斑纹样的毡毯垫子,颇能说明问题。至于在北朝和隋唐墓骑马俑上所见铺在鞍子上的各类动物皮毛制成的毡毯垫子,则不胜枚举。这显然是充分考虑到动物皮毛的耐用、保暖、防水性能,与驮囊覆盖物的使用道理相同。因此,无论是毡毯的覆盖物还是动物皮制成的驮囊,均是为了在长途贩运过程中有效保护

货物不受风沙雨雪侵害。

莫高窟第61窟五代五台山图中驮载物品的骆驼、毛驴身上,所见驮囊均无兽首动物皮毛制品的特征(图一〇),似乎表明到了这一时期,中原商旅在货物运输中,载物的驮囊多使用以布、棉、麻、毛等织成的袋子。此点也可在宋、辽、金壁画中得到印证,如内蒙古通辽库伦旗辽墓壁画出行图中骆驼身上的驮囊,多是方形袋子(下页图一一)^⑧,看不到唐代骆驼兽首动物皮毛制品特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元明墓葬中,其实这正是宋代以来丝路贸易逐渐衰落的反映。

至此,可以看出,中古时期丝路贩卖包括丝绸及其制品在内的贵重商品和东西方奢侈品,无论是短



图八 山西太原斜律彻墓出土陶骆驼



图九 陕西礼泉唐郑仁泰墓出土陶骆驼



图一〇 莫高窟第61窟五代五台山图中的行旅



图一一 内蒙古通辽墓壁画中的驼队

程的如吐鲁番阿斯塔那M59出土《石染典过所》记载从西州、伊州到沙州、瓜州的胡商贩运,还是粟特文信札记载从洛阳到撒马尔罕的长途贩运,抑或是正史所记从波斯、中亚、西域到长安的使团出使,骆驼、毛驴、骡子驮载物品必然要通过驮囊包装才能保证运送物品完好到达目的地。因此,各式各样驮囊的使用则成为丝绸之路交通贸易顺利进行的保障。而对驮囊最丰富的图像呈现,则是大量唐墓出土的三彩和陶骆驼。其中的兽首驮囊形象,曾被认为是丝路上的祆神图像。本文的探讨,揭示出丝绸之路贩运时用来保护货物的兽皮包装驮囊及其使用现象,或为理解丝绸之路商品贩运、唐墓出土三彩骆驼的制作等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以还原此类图像的本来面貌。

注释:

- ①[日]森丰《丝绸之路的骆驼》,(日本)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 ②Elfriede Regina Knauer, *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 Iconography and Ideology of Chines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Han to Tang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rade Along the Silk Routes*, Zurich: AKANTHVS, 1998. 参见荣新江《书评·〈骆驼的生死驮载——汉唐陶俑的图像和观念及其与丝路贸易的关系〉》,《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唐墓(M31)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冉万里《“丝绸之路”视野中的一件三彩骆驼俑》,《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
- ④葛承雍《丝路商队驼载“穹庐”“毡帐”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3期。
- ⑤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
- ⑥(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279~30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⑦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善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⑧相同记载另见《太平广记》卷四八〇,仅个别文字有出入,改“皮袋”为“毛袋”,“脂酥”为“脂苏”,第3956页,中华书局,1961年。

⑨姜伯勤《唐安善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张庆捷《北朝唐代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⑪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第168、169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⑫沈骞《从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四)”骆驼图像看所谓“唐安善墓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⑬孙机《唐代的胡人》,《中国文物报》2008年8月13日。

⑭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59号唐墓》,《考古》1972年第3期。

⑮崔世平《“刻毡为形”试释——兼论突厥的祆神祭祀》,《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

⑯长武县博物馆《陕西长武郭村唐墓》,《文物》2004年第2期。

⑰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图版35,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⑲乾陵博物馆《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40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⑳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㉑同⑭。

㉒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关林1305号唐墓的清理》,《考古》2006年第2期。

㉓葛承雍《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4期。

㉔同④。

㉕(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九三,第1448页,中华书局,1961年。

㉖葛承雍《“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

㉗王子今《秦汉名物丛考》,第168~170页,东方出版社,2016年。

㉘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第35~54页,中华书局,2014年。

㉙Barthold, W.,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58, pp. 235-236.

㉚(宋)王欽若等《册府元龟·外臣·朝贡》,第11228页,凤凰出版社,2006年。

㉛邢义田《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东方》,《画为心声》,中华书局,2011年。

㉜(唐)杜佑《通典·食货六》,第114、118、119页,中华书局,1988年;《新唐书·地理志》,第972、973、1044、1045页,中华书局,1975年。

㉝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㉞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大量元代俑》,《文物》1979年第4期。

㉟同③。

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斛律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

㊲陕西省博物馆等《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

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辽代壁画》,图版57,文物出版社,2009年。